

近代德国的官僚文化



徐健

我第一次去德国,两种颜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种是白色——皑皑白雪;一种是黑色——黑森林,绿色的森林,深邃的绿。后来随着我对德国历史研究的加深,我发现这两种颜色恰好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的两面性:既有理性,也有疯狂。德国的民族国家发展历史是很短的,在历史上被称为是“迟到的民族”,很晚才统一。最开始德意志王国是由很多小的邦国,由分散的领地组成。比如1521年时就有347个小邦国存在于德国的土地上。这种分裂的情况直到拿破仑战争才有所改变,因为拿破仑战争把德国原有的大量邦国缩减为34个,直到1871年又由34变为1。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政治体。经济发展十分不健康。这导致当时的德国视野非常狭小,政治意识淡薄,社会力量发育不健全。

因此国家这个概念就被摆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国家的代表是君主,君主制传统因此根深蒂固。由于王权的加深,导致君主事务繁忙,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力下移,转移到各级官吏手中,这就是所谓“官僚政治”的形成(大概形成于16世纪-18世纪)。官僚政治是历史上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即从原来封建时代的贵族政治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的时期。官僚政治需要大量官吏,而大量官吏的出现使得一套严格的官僚体制的建立显得十分必要。

官员的培训和选拔制度刚开始时依据的是候选者的门第、出身、个人信仰(是否信教)、身体健康情况等条件。到了1770年,普鲁士开始引用考试制度。普鲁士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邦国,普鲁士的官僚制度对于后来的德意志帝国、一战后的德国都具有深刻影响。考试制度是针对政府高官的。考试一共分为三次:第一次在大学毕业后,通过后成为见习生;第二次考试时间在长官引见实习结束后,通过了就成了初级候补官;第三次在取得初级候补官4个年头左右,在长官认可了工作成绩后可参加国家考试,通过后成为高级候补官。

从以上这个漫长的考试过程来看,要想成为普鲁士的官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而这个过程必须考虑财力和家庭背景因素,贫寒子弟要熬过这十几年还是很不不容易的。但即使如此,这个制度已经比之前的选择标准公正多了。

考试内容是什么?在18世纪,考试开始强调教育和知识水平。以财政学、警察学为例,考试学的本质就是怎样增加国库的收入,而警察学的主要内容则是维持秩序。

进入19世纪,考国民经济学、行政管理学,同时要求官员对古典文化有深厚的涵养,因为他们相信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可以传授人文主义和道德伦理,而希腊语和拉丁语可以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法律的学习。当时普鲁士已经开始向现代民主国家过渡了,家长制的做法已经不能有效统治这个国家了。可以说19世纪中期的普鲁士官员都是法官,甚至官员们的培训都在法院进行。有的官员因为没有法律方面学习的经历导致无法继续在政界升迁,只好改作他行——从这也可以看出法律学习在官员选拔中的重要作用。大学文凭也是官员升迁的重要凭据——高级官员往往是大学毕业,而低级官员更多的没有上过大学。可以说,当时的官员考试选拔制度是有其优点的:首先这是一种民主的用人原则,不是只有贵族才可以做官,中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人通过学习也能改变命运。这种选拔体制也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念,知识和教育是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好学之风贯穿社会的各个阶层。

怎样建设官员队伍?对于官员的责任感及荣誉感的培养,在早期主要靠君主的督促。普鲁士历代的君主都是“明君”。比如弗里德里希大王就曾说过“君王应时刻在岗位上”,强调由君主督促官员忠于职守。法制的色彩在不断加强,制定了专门约束官员的法律《官员法》。规定十分详细:几点上下班,什么情况可以休假……而违反这些法律的惩罚也是十分严厉的。比如对于官员非法收受礼品:罚款,或是蹲监狱7个月;如果官员主动提出索要礼物,就要判处5年的劳教,对于更为严重的情况,则是免除公职。除了“罚”之外,也有奖励制度:提升职位,提高工资,提高社会地位,这意味着:出门可以乘坐漂亮的马车,住舒适的房子,在社交场上维持体面的费用由政府承担,甚至一定比例的家庭生活费用也是与级别挂钩,由政府负担的。但即使如此,普鲁士的官员生活是很节俭的,在1825-1850年的25年间,德国官员竟没有一次加薪,这其中还不包括通货膨胀的影响。

责任感的培养仅靠惩戒和奖励是不够的。惩戒只会给人畏惧,而过度的奖励又会适得其反。因此官员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除了法律手段之外,也靠“德治”,用道德的力量进行约束,培养官员的良心和道德。一般办法有两种:一、“军事化”——通过安插退役或伤残的荣誉军人在政府部门中,来影响官员的精神面貌。二、理论灌输。比如灌输马丁·路德的新教职业观——为上帝而工作,这是“天职”。德国的启蒙运动注重内心世界的改造,使人们能够通过内心悔悟来完善道德。在当时的普鲁士,这样一句话如果被刻在官员的墓碑上会被视为最大荣耀——“他清楚自己的职责”。

官僚政治毕竟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的产物,最终还是要走向下一个目标:民主政治。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官僚制度在某个阶段所起作用越大的话,是不是对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阻碍就越大?这也是需要我们继续思考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500年来的近现代科技史证明,一个国家科学精神迅速普及之后,随即便成为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中心。

对中国而言,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科学精神也不例外。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只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并不包含现代科学精神,这是传统中华文化唯一的缺失。虽然在14世纪之前,中国的实用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因为只强调实用性,缺乏探索自然普遍规律的科学传统,因此15-19世纪的近现代自然科学并没有在中国诞生。自从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思想一起进入了中国人的意识,为科学精神的弘扬开辟了道路。但是,由于世俗功利主义的力量强大,不少人搞不清科学精神的内涵和科学界的职业底线,出现了不少民众深为厌恶的论文抄袭和造假行为,扰乱了学术秩序,令人痛心。由此可见,实现工业化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初级阶段,只有用科学精神丰富中华文化传统,加强全民族的科学进取心,削减民族心灵中的功利心,中华民族才能成为世界最聪明和最有创造性的民族,完成全面彻底的振兴。

中华民族不仅需要“科学救国”和“科教兴国”,还要建设人文最文明最优秀和最先进的社会。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党中央的指引下,把科学精神这朵美丽的花,牢固地种入中华民族的心灵,建设创新型

做知识社会的精英

■杨文采

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科学工作者是科学精神的实践者,对我们而言,要按照科学精神培育自己的气质,以“更理性、更精确、更客观、更系统和哥本哈根精神”指导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为人类共有的知识宝库添砖加瓦。首先要有持之以恒的动力源,即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宝库添砖加瓦的奉献精神。科学精神是人类发自内心的对智慧的不懈追求。科学精神与功利欲或权力欲是相抵触的。爱因斯坦说过:“科技界有三种人:为了功利搞科学研究的人,因为兴趣而搞科学研究的人和为人类知识扩‘容’而从事科学事业的人。上帝要我们把前两种人从科技界赶出去!”爱因斯坦的这种提法未免极端,但强调为人类知识宝库添砖加瓦的奉献精神,应该成为科学工作者的座右铭。

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要了解知识创新的例行程序。当代人的智力是在前人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构筑的。因此必须具备尊重前人科研成果的敬业精神,吃透本专业已有的科学发现,才能避免毫无价值的重复性研究,进行创新。研究成果写成公开发表的论文,证据要充分。科学论文的发表,起到“公示”的作用,让同行专家来评论作者的成果是否“更理性”,或“更精确”,或“更客观”,或“更系统”。论文或者被负面地质疑,或者被正面引用,都是对公示的“创新知识”作出的客观评价。如果在论文发表5-10年内没有被负面地质疑,而且取得本

专业的高引用率,可以认为这项新创的知识已被公认。

科学工作者要规范科研道德,坚守“有一说一,不说不假话”的学术诚实底线。尤其是不不要为个人名利去抄袭和造假。要吃透本专业已有的科学发现,尊重前人和他人的科研成果;除非已成为行业内的常识,引用他人成果时一定要注明出处。文章一旦发表,是收不回来的,要尽可能严肃认真地修改文稿,不出错误。一旦发现错误,一定要知错认错,感谢指错人,绝对不能威胁谩骂,进行人身攻击。要自觉维护同行评议的客观公正性,自己的研究成果要由别人评论,切忌自吹自擂。

有人问,想赚大钱又懂科学的人能否成为科学家?是的,想赚大钱又懂科学的人能成为专家,想赚大钱又懂科学的人也能成为技术科学家。但是,想赚大钱的人很难成为基础科学研究科学家。基础科学研究科学家只占科技界人数的10%左右,常人往往不太理解他们。基础科学研究科学家是一群永不间断永不对抗的“跳高”运动员。他们不和别人争,总是给自己出难题;当他们跳过一个学术高度之后,自觉地把横竿升向更高的学术水平,为人类共有的知识宝库添砖加瓦。他们是一群有特殊追求的人,是利益对抗中的弱者。希望社会理解他们,支持他们去提高人类智慧和文明的水准。

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有意愿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杨文采

的人最有可能成为知识社会的精英。在知识社会中,科技引领未来,教育推动文明,弘扬科学精神,提高民族的智力水准,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行为和智慧,直接或者间接地为知识创新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有了具备科学精神的新一代优秀青年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有了坚实的保障。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确立海洋强国目标 实施国家海洋战略

■李靖宇



李靖宇

洋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能源和资源压力日益加大、高能耗和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系的今天,发展海洋经济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占据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新机遇。科学规划和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建立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第一要义。

近几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强劲。但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仍然相对弱小,与海洋强国还有一定的差距。方向既然已经确定,路径的选择则成为了关键。提纲领,当前亟待提上日程的就是国家级海洋战略的出台和推展。

从多年海洋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必须要出台国家级的海洋战略,必须要有统一的国家级规划,把沿海11省市区的规划衔接在一起,进行规划统筹衔接、资源统筹配置、产业统筹推荐、设施统筹建设,生态统筹治理、交通统筹安排,甚至国家对海洋开发投资也要统筹考虑。不然,各省做各省的,一定会出现过度开发、严重污染和重复建设等问题。

坚持陆海统筹原则

环顾国际和四周海域,不仅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传统的海洋大国早已推出国家海洋战略,就连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近年来也纷纷制定国家级海洋战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飞速发展和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升温,国家海洋战略的缺失已经成为了海洋问题的掣肘之一。

以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百字方针为指导,中国目前正在制定由有关部门联合起草的国家海洋战略。而辽宁师范大学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正是有关国家海洋战略软科学

课题的承担单位之一,预计国家海洋战略不久就能颁布和实施。

这一纲领性文件至少囊括两大方面,包括海洋安全战略和海洋发展战略。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陆海统筹上升为国家大战略,与处于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共同形成三位一体的国家战略体系。

从地图上看,中国沿海经济带从南到北呈现大“S”形状,必须把海域整合为新板块,纳入国家区域开发总体战略中来。中国创建大“S”形海域经济带的战略,一是有利于国家宏观经济统筹协调的协调发展,二是有利于打造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依托,三是有利于形成全国海洋经济开发的整体阵容,四是有利于加快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开放步伐。

陆海统筹国家战略推进,既涉及到陆地也涉及到海域,所以要从实际出发依托陆地来面向海洋循序渐进,依托已经掌控的270万平方公里海域向被他国染指和侵占的260万平方公里海域逐步推进,这就需要强大的海上力量保驾护航。

而在软科学课题研究,我们也建议:在保证太平洋通道安全的同时,必须致力于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形成“两洋出海”的战略格局;要确立中国海洋开发大安全观,海洋开发安全不仅是指海洋权益安全,还有海洋经济发展安全、海洋社会进步安全、海洋生态环境安全、海洋运输通道安全、海洋军事保障安全等等,所以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树具有全面性的中国海域开发大安全观。

建设海洋城市总部

目前,全球70%以上的财富都集中在各国

沿海城市,在这样的国际市场发展态势下,推动我国沿海城市大连等创办“世界海洋城市总部”迫在眉睫。沿海城市要勇于担当,以国内巨大的市场为吸引力,以沿海经济圈为切入点,吸纳全球沿海高端城市政府代表或民间商业组织为会员,积极创办“世界海洋城市总部”。

世界海洋城市总部项目的宗旨和目标,就是要更加珍惜、保护与合理利用海洋资源,让人类进一步认识和遵循海洋的自然规律,联合全球海洋城市力量,共同解决好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问题,迎接海洋时代的到来。

“世界海洋城市总部”项目包括世界海洋大厦、世界海洋博览会场馆、全球市长俱乐部、世界海洋城市官邸、世界海洋资源资料中心。

以大连为例,实施这一战略举措能够以民间力量逐步整合全球资源,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轴心国铺平道路,能够为大连创建东北亚重要国际航运中心、成长为现代化国际名城打造品牌,所以有必要加以现实论证。

而世界海洋城市总部战略,将为国内陆地城市打开与世界各国城市对接的窗口,加快国家中西部城镇化脚步,全面拓展农村市场。同时,也将为各城市企业对外贸易提供一个稳定的低成本平台,并为其解决各种对外贸易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更重要的是世界海洋城市总部将吸纳世界各城市的闲散资金,为国内城市提供低成本的引资平台。同时,也为国内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企业提供一个走出国门对外投资的窗口,以减轻国内的环境压力。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兼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本报记者郑金武采访整理)

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使命

■冯支越 何威

果,发现并掌握了DNA技术,为日后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与技术基础,同时,MIT也先后有5位相关学科的学者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北京大学基础学科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在多个基础科学研究领域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水平,完全能够开展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统化、高水平的科学研究。

文化的引领者和传播者

研究型大学不仅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和科学研究的重镇,还应引领和传播先进文化,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力量。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人才,需要科学研究,更需要整个社会对创新型文化的理解、认可和支持。

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部分群众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尚未确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研究型大学作为重要的教育科研机构,也同样具有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能,向社会传递正确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念理应成为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责任。就研究型大学本身而言,文化是教育的灵魂,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都需要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进步、科学的学术风气和校园文化。这种文化是校园内一切有形和无形的事物的集合与升华,能够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



冯支越

的生活中,影响人,塑造人,并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着个人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和国家创新文化的培育和形成。

研究型大学对于社会文化的积极作用不仅体现在引领社会的创新文化和风气,还体现在传播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素质上。研究型大学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基地。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这一目标,国务委员刘延东明确要求

“处理好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普及的关系,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夯实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为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方针和发展目标,研究型大学自身肩负起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双重职能,在扎实推进科学研究的同时注重发挥自身教育者的社会功能,面向社会、面向大众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土壤。

大学的职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三个方面,研究型大学的职能来源于此,但在关注重点和执行方式上较之前者具有显著的差异。研究型大学自身的职能是其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前提条件,人才培养职能使研究型大学成为创新型人才成长的摇篮;科学研究职能使研究型大学成为科学研究的重镇;社会服务职能则使研究型大学成为先进科学文化的引领者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国内综合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不仅是践行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内在要求,也是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中对科技、人才支持的客观需要,更是当代高等院校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进程的典范和榜样。

(冯支越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何威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